

# 科学把握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关系\*

朱继东

**【内容提要】**对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正确认识、科学处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既有不少成功经验，也有一些惨痛教训。改革开放以后，关注的焦点逐渐演变成如何正确认识、科学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何科学辨析和正确处理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重要思想研究，尤其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如何科学认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关系的系列重要论述的深入剖析，既认真总结成功经验，也不回避曾经存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强化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不可偏废这一重要共识。

**【关键词】**经济建设 经济基础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能力

**作者简介：**朱继东（1975-）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732）。

对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正确认识、科学处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既有不少成功经验，也有一些惨痛教训。改革开放以后，关注的焦点逐渐演变成如何正确认识、科学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正是看到了片面注重发展经济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不少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sup>①</sup>。通过继承、发展、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思想，科学剖析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sup>②</sup>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不可偏废这一重要共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理论

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如何看待和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直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新工程“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MYC201808）和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研究”（2015MZD048）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

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深刻认识到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重要关系，而且为后人科学剖析、正确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导。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重大科学论断：“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sup>①</sup>这一论断不仅强调了经济基础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也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基础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关注和思考。1893年7月，恩格斯又进一步剖析了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之间的曾被长期忽略甚至被错误认知的作用与反作用：“与此有关的还有意识形态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些先生们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sup>②</sup>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一开始就非常关注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科学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仍有重要指导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且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社会的经济结构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等，更进一步揭示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③</sup>这一表达深刻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科学关系。恩格斯也非常关注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致信康拉德·施米特时，就深入剖析了这种关系：“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sup>④</sup>恩格斯不仅剖析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非常重要的反作用，更提醒人们要弄清楚意识形态究竟能不能独立于经济发展。1894年1月，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再次强调了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sup>⑤</sup>恩格斯不仅强调了影响人类其他活动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活动就是经济活动，意识形态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就是经济发展，更提醒我们要科学把握、正确处理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列宁非常重视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提醒大家要正确认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sup>⑥</sup>同时，他也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重要反作用：“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59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⑥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222页。

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sup>①</sup> 列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非常重视处理好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对忽视意识形态的错误言行给予坚决的反对和批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醒全党要正确认识意识形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么，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告诫全党要认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对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不仅提出了一个至今影响深远的论断——“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sup>③</sup>，而且进一步强调：“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sup>④</sup> 并且，随着认识不断深化，毛泽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认识更加深刻、透彻。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间，他组织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并发表多次谈话，在谈话中特别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sup>⑤</sup> 他提醒全党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在革命和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作用，澄清了党内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使更多人开始认识到意识形态革命对生产力的重大影响。认真学习、领会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可以使我们更加科学地认识意识形态工作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科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教训。

## 二、片面注重发展经济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导致的弊端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非常重视科学辨析和正确处理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但由于一些原因，改革开放以后，受西方错误思潮的影响、冲击乃至误导，再加上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片面强调甚至错误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重视发展经济而轻视、忽视甚至漠视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这一现象在某个时期内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在有些地方还非常严重。由于这些错误认识长期得不到彻底纠正，导致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思潮几度泛滥严重影响了经济基础的巩固，导致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在中国长期受到一些专家学者乃至党员干部的追捧，一度误导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决策，产生了巨大危害，留下了极大隐患。

一是轻视、忽视甚至漠视意识形态工作导致信仰迷失、道德滑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巨大冲击。在改革开放之初，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意识形态工作在一些地方被轻视、忽视甚至漠视。由于“非毛化”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再加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机加大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渗透的力度，一些人打着“反对个人崇拜”“消除个人

①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9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



崇拜”等旗号大肆攻击、抹黑和诋毁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被曲解、污名化。一些所谓的“改革派”借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之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鼓吹、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言论，推动“意识形态多元化”“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等错误思潮在中国公然登场并且蔓延，甚至在一个时期泛滥成灾。在一段时期，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故意混淆指导思想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与社会思想多元化等概念，宣扬改革开放就应该打破保守的传统思维，应该告别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允许甚至提倡指导思想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有的人还嘲弄说什么“主义也不能当饭吃”等，公然提出，少说最好不要再讲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宣扬对新自由主义等思潮要多包容、借鉴、学习，认为西式民主是个好东西，西式民主应该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等，从而变相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此外，社会上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沉渣泛起，个别领导干部贪财、好色、腐化、弄权等腐败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纠集在一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危害。邓小平曾警醒全党在工作重心已经转变为经济建设后要看到已经出现的问题，批评有的人只是埋头抓经济工作却忽视甚至不管不问思想工作等问题，提醒全党在新的形势下仍要抓好党的思想工作。后来，他又进一步批评：“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sup>①</sup>邓小平指出了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巨大危害性，给全党敲响了警钟。但遗憾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并没有真正重视邓小平的提醒和批评，导致意识形态工作被轻视、忽视甚至漠视的问题继续存在。

二是轻视、忽视甚至漠视意识形态工作导致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错误思潮在经济领域泛滥，影响甚至冲击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重要派别，新自由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在国际经济政策乃至意识形态扩张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新自由主义不仅积极鼓吹经济资源私有化、经济活动自由化、经济调节市场化、经济利益最大化、国家干预最小化、全球经济资本化，而且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和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从骨子里反对并采取多种手段恶意攻击、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新自由主义鼓吹人们应像崇拜上帝一样来崇拜市场、大力宣扬和积极推行私有化等，表面上看是一种经济思想，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由于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空泛化，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不断扩大，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并受到一些党员干部的追捧，自然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随着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泛滥，不仅有人大肆宣扬“彻底私有化”等错误论调，也有人盲信、迷信市场化，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而且还有人竟提出“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等谬论，更有人企图把经济体制改革演变成经济制度变革。这在经济、政治指导思想上都引起较大混乱，也引发了一些人对我们能否坚持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担忧，影响甚至冲击着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三是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思潮蔓延和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泛滥相互交织，严重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安全。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思潮蔓延和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泛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破坏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轻视、忽视甚至漠视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导致精神文明建设长期得不到应有重视，西方的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新闻自由”等为代表的错误思潮冲击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而且理想信念动摇、信仰迷失、道德滑坡等问题在较长一个时期内突出存在，党员干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

部腐败堕落问题长期得不到有力惩治甚至在有些地方、部门、单位越来越严重，再加上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在国内外敌对势力不断妖魔化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攻势下，对改革开放的质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疑乃至对中国共产党的质疑开始出现，干群矛盾激化、群众性事件不断、颜色革命风险加大等问题凸显，严重威胁着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安全。

### 三、习近平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关系的论述

结合意识形态领域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我们深刻认识到，直面意识形态领域多年积累下来的众多问题，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深刻剖析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并科学处理好，是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鲜明特色。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下称为“8·19”重要讲话）中，不仅直面当时的轻视、忽视甚至漠视意识形态工作等众多问题，更把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在此后多次强调。他不仅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sup>①</sup>，而且还从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高度强调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要求和警醒全党：“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sup>②</sup>这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对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的警醒和指示，也标志着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8·19”重要讲话中，针对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没有正确认识、科学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关系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首先强调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随后批评了有些地方、部门、单位轻视、忽视甚至漠视意识形态等工作的错误思想。在此基础上，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sup>③</sup>。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剖析了党的群众基础、执政基础究竟是什么，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党如果在精神上丧失了群众基础会有多么大的危险，警示全党永远牢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决不能一强一弱、一实一虚，澄清了不少错误思想和认识。

为进一步强化全党对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关系的科学认识，在“8·19”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醒全党要清醒认识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巨大危险，而且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国内在理想信念、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深刻剖析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要求全党要深刻认识到二者作用与反作用的重要关系，从而真正做到“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sup>④</sup>，并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职责，在直面问题、剖析问题的过程中明确了正确认识、科学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关系时必须牢记的基本原则和科学遵循。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③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3页。

④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其实，早在1982年12月，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不仅明确要求“我们必须振奋精神，采取有力措施，马上行动，迅速扭转被动局面，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而且进一步强调指出，要“进一步解决认识问题，真正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战略方针来抓。首先是克服精神文明建设是‘软任务’的错误思想。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都是硬任务。它们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相互促进，不可偏废”<sup>①</sup>。他不仅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而且指出了当时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偏废，并在此后多年一以贯之，从未改变。2004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不仅撰文指出：“磨刀不误砍柴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思想认识上的收获，比我们在发展上的收获更有长远意义。”<sup>②</sup>在同年12月他又进一步指出：“要认清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标，但都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sup>③</sup>在有些人盲信市场、迷信市场的时期，他不仅强调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而且批评当时存在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工作的错误言行，更从最终目的的高度强调了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工作都要抓好，让更多人认识到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凸显出其政治清醒和政治坚定。

2005年7月，习近平在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上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而且文化还广泛渗透于上述各种力量之中，成为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重要因素。”<sup>④</sup>这里文化的核心就是指意识形态，他通过剖析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让更多人深刻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2006年5月，在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所做的总序之中，他又一次特别强调：“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sup>⑤</sup>这就是提醒大家要深刻认识到文化的软实力和经济的硬实力、文化的力量和物质的力量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增强抓好文化建设的共识。

在2013年7月举行的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虽然会议的主题是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但习近平总书记却特别强调指出，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既包括意识形态方面，也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而且这两者往往很难分开。掌握好舆论主导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做好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舆论引导，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待和部署意识形态工作，是将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更宽广的视阈中加以强调，可以更加科学、深刻地认识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同年11月，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语重心长地警醒全党“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sup>⑥</sup>。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提醒全党“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

① 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②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③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④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和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241页。

⑤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和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⑥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时，特别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sup>①</sup>，警醒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要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真正对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同等重视、一起部署、共同抓好，绝不能偏废，既要通过大力抓好经济建设为科学推进“四个伟大”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又要通过狠抓意识形态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精神引领和思想保障。

#### 四、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

实践发展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要进行理论创新，就必须对不断变化的实际进行科学把握、做出科学判断，必须坚持一切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并在直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的基础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时代中国的新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sup>②</sup>，这就要求我们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新时代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要澄清一些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误读，又要正确认识、科学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在伟大斗争中实现新目标。

一是正确认识、科学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坚持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切真正的科学理论体系、思想体系都是具体时代的产物，理论创新不仅离不开实践，而且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推进伟大实践创新的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摆在全党面前，需要通过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来加以研究和解决。要正确认识、科学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就要进一步加大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的力度，科学辨析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经济建设之间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sup>③</sup>。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如果不能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能科学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只是一味地空谈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工作也无法真正抓好。只有认真直面、深入剖析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变化，正确认识、科学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去努力解决好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才能真正提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而更好地进一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并多措并举大力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绝不是单纯地、孤立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真正把经济建设、意识形态工作都搞好，从而更好地为巩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基础服务。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把思想、行动真正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让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页。

<sup>②</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sup>③</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

的辩证统一关系，必须同时抓好，使之齐头并进。在新时代的今天，要沿着正确道路统筹推进“四个伟大”，就既要大力抓好经济建设，又要努力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使二者在良性互动中形成更强大的合力，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好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复兴。

二是高度重视和大力抓好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确保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更好地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深入剖析改革开放40年来的得失可以发现，由于新自由主义等错误的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泛滥，无论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还是鼓励私营经济发展，或者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等，都有一些地方、部门、单位被错误的思想所误导，边缘化、空泛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攻击、抹黑、诋毁甚至否定国有企业，把一些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核心利益的关键领域盲目开放，误导了经济改革的前进方向，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质量，甚至危害到国家经济安全。更有人指责抓意识形态工作是干扰经济发展，呼吁要让意识形态彻底从经济领域退出来，类似错误论调在党内外都产生了恶劣影响。这也警示我们，要确保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建设好现代化经济体系，就要认清新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本质，认清他们让意识形态彻底从经济领域退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取消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深入学习、大力贯彻好新发展理念，以多措并举狠抓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为抓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警惕有人打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旗号推进私有化，警惕有人打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旗号，却是要搞经济制度变革，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坚定不移地捍卫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更好地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前进，要深入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也要深刻剖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多年的一些教训，特别是认真总结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看到盲目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巨大危害。一定要科学辨析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进一步凸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决反对盲信市场、盲从市场甚至迷信市场的言行，让更多领导干部都深刻认识到市场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切实提高在新时代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制度、法治的轨道前进，早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要进一步强化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不可偏废这一重要共识，就必须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思想指南、行动指南，科学辨析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而且要通过全方位创新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水平，特别是深入剖析一些地方、部门、单位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的思想塑造不到位、理论不清、立场不鲜明、实践中建设不力等问题，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大力加强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坚决落实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大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良性互动中形成更强大合力，进一步开创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局面。

#### 参考文献：

- [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 [2] 沙健孙：《毛泽东思想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 [3] 朱继东：《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 [4] 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 [5] 朱继东：《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编辑：刘 影）